

渴望岁月静好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抗震救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对照一下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写灾难中的人情人性，更有大量有血有肉的真英雄的感人描述。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个教学楼的学生全被压在废墟下，少数几个幸存者在黑暗中等待救援，他们相互呼喊名字，一起唱流行歌曲，还相约“出去了一定要好好学……”

我所以会把这些和伊斯梅尔·比亚的长篇报告文学《长路漫漫》联系起来，是因为书里也有一段，写一群被卷入残酷战争的孩子，被联合国和平组织从战火中解救出来，当他们偷偷约好去弗里敦市区看一看时，其中一个心酸地说：“要不是因为战争，我本来可以到弗里敦上学的……”

——在灾难和战争中，渴盼和平的美好的生活，这本是人类的多么正常而健康的心理啊！

《长路漫漫》写塞拉利昂一个十二岁少年比亚的传奇经历。他本来英语学得很好，喜欢唱“说唱”歌曲，还曾结伴上台表演并录了磁带。可是战争来了，家园毁了，家人大都死于战火，他和几个少年到处逃难，饥饿和恐惧每天追迫着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拿起枪，为了复仇，也为了自卫。然而战争是一种吞噬人们灵魂的怪物，他们很快成了杀人恶魔，以疯狂杀死对手（通常也是与他们差不多的孩子）为乐，同时也学会吸毒，也会抢劫无辜的百姓了。这一切描写得十分真实，但我以为，这本书真正好的地方还不在此，而在它的后半部，即联合国和平组织设法把一批童兵运离战场，为他们医治战争创伤。这时出现了更其惊心动魄的场面：素不相识的非洲孩子坐在一起，虽然这已是和平环境，但他们发现了对方身份的痕迹——原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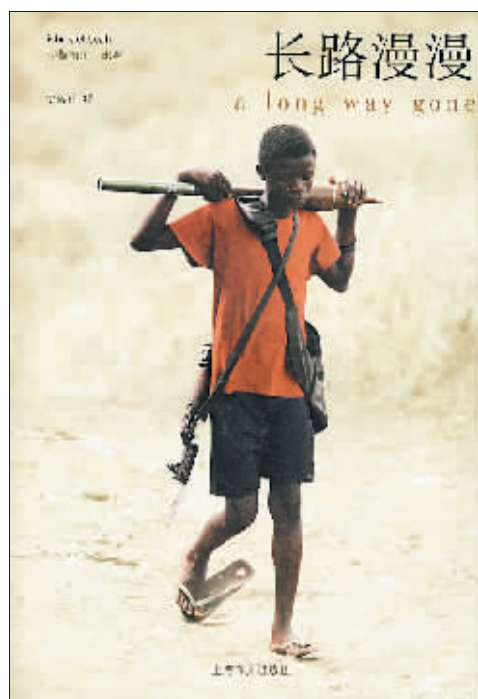
是来自敌对阵营的，于是立刻大打出手，完全是往死里打，有六个孩子被当场杀死，大多受了重伤，联合国工作人员或受伤或逃离，场面惨不忍睹。这时我们才发现，让一群阳光男孩走入战争是何等不易，但要让他们从战争中走出来，更是极为艰难的过程。过去的作品，以这种走出战争、回归人性为题材，并能达到如此生动地步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到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与一些中国作品，有些故事的前半还是颇为相似的，即写地主诱奸或强抢农民女孩等，真正的不同是在后半。《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想要赎罪，想从火坑中救出玛斯诺娃，却遭到了严酷的失败，不光是因为社会制度和环境气氛的不人道，更因为玛斯诺娃自己已彻底改变了——要把一个改变了的人变回来，谈何容易！我也想

到过去中国的战争文学，无论写抗战还是国内革命战争，其中都不乏“童兵”。儿童被卷入战争，或积极投身于正义战争，这都是可理解的。但战争（尤其是“童兵”）毕竟不是正常状态。多少年来，我们把战争渲染为最神圣、最美好的状态，而又从不提及“走出战争状态”的重要和艰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和教训。“文革”开始时，红卫兵豪迈地宣称：“我们没有赶上长征，没有赶上抗战，但我们赶上了‘文革’！”他们后来的打砸抢烧杀，与此前的文学对战争状态的神圣化渲染，不能说没有关系。

正因为此，我郑重推荐这本成功描述“走出战争状态”的《长路漫漫》。我也因今天地震报道中不断出现对平静美好生活的真诚渴盼而感到深深的欣慰。

■刘绪源



2008年1月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于海江译
《塞拉利昂》伊斯梅尔·比亚著
《长路漫漫——一个童兵的自传》

对文学真相的发现

在希腊语中，“批评”的含义是“判断者”。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就是一个对文学作品做出客观公正判断的人。关注现实，对最新的文学作品进行筛选和评判是文学评论家的责任。然而，如果仅仅是把目光对准当下，用新闻人的敏感来捕捉市场的风向，即使评论家具有现实关怀的情感，对时代做出了迅速及时的反应，也难免会缺乏独立的批评精神。评论家是生活在当代的历史与现实的判断者，但更应该是未来的预言者，他应当借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来指出未来的方向和道路。这并不是漠视历史正典和远离现实，而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真正尊重。体现的是一个评论家的对社会付出的道义与责任。

弗莱在《批评之路》中提到：理论批评首先要说明文学经验的主要现象，其次要导致对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不朽的魂灵》正是对文学作品永恒性在这个意义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论者并没有孤立地讨论经典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将文学的永恒性放置在一个历史和现实构筑的坐标系上来讨论，经典文本在此被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结构，一种能够传达文学深层文化和社会意蕴的审美活动。

论者关注的不仅是文学经典本身，还包括其同文学的整个生产与消费、同文学知识与艺术素养等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论者在研究大量经典作品的基础上，对当下文学的现实境遇，文学作品的深层机制，永恒不朽的奥秘意蕴等问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如果论者的目光仅仅是停留于此，其研究意义与同类研究相比便没有更大的超越。研究者清醒地意识到“变，是文学的常态与特性，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与正道，一刻不停永不满足地追求新求变，文学才会拥有远大的前程。”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做出预测都是具有风险性的，但严谨的理论研究者应当具备这种甘冒风险的严肃的科学精神。论者没有回避文学发展将带来的种种可能与后果，在客观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了文学未来发展的可能中，这样的研究与流行于现代批评的以妙语连珠为满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研究风格有着明显的高下区别，显示出的是一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非同功利的社会良知和对文学现状清醒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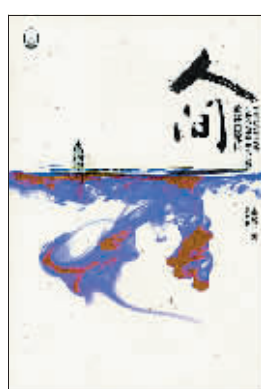
这种超越个人与社会厉害关系，远离实用主义目的的研究方式，使得研究者敢于在“我们该怎

么办？”一章中，直面急功近利的市场化写作，立场鲜明地表示“我之所以要深入地发掘和研究文学的永恒性与不朽价值，目的就是要反对平庸，反对轻浅，反对一次性消费，反对文学的低俗化倾向，防止文化、艺术和心灵走向堕落，帮助文学认准方向，重新走向深沉、博大和辉煌。”并旗帜鲜明地提出“用灵魂写作”的口号。目前文学评论界对当下文学现状进行细致分析，表现出忧虑与失望的文章不少，但愿意指出方向，真正意义上推动文学创作繁荣，对文学创作起到建设性作用的声音却不多。

优秀的文学评论应当是对文学真相的发现，是对优秀文化的传递，是对真理孜孜以求的追寻。《不朽的魂灵》无疑是具备这些要素的，它因此具有了批评的力量，一种能够对文学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力量；一种能够抵达人性，抵达真理的力量；一种能够在喧哗的世界里给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者以方向的力量。

■余雷

《不朽的魂灵——文学永恒性探秘》蔡毅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年9月版



《人间——重述白蛇传》
李锐著
重庆出版社
2007年4月版

以神话之名的训诫

虽然作为“重述神话”的国际写作计划宣称绝对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和独立性，但既然是一个有系统的策划行为，置身于其中的人难免受到牵制。题材的限定无异于又一重枷锁，正所谓“戴着镣铐跳舞”，“镣铐”的沉重束缚与“跳舞”的轻盈自由本身就是一对先天性的矛盾，苏童的《碧奴》和叶兆言的《后羿》已以写作实践证明了这个矛盾。

李锐《人间》重述白蛇传，千百年来，人们在白蛇传奇中寄放了在现世生活中最无望的希望，通过人与“妖”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想象中，不断丰满起单薄的生存境遇。《人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白蛇传奇的基本元素：许宣（作者根据明朝话本记载将“许仙”正名为“许宣”）与白蛇的爱情、白蛇与青蛇的姐妹情谊、法海与白蛇青蛇的人“妖”大战。但既为“重述”，原有元素的排列组合与古老神话自当不同。在《人间》中，李锐努力铺展白蛇传奇，意图赋予它以现代的意义和特质。他从古代和现代两个空间向度搭建起白蛇故事的线索，在古代，有白娘子和许宣的碧桃村生活、小青和情人范巨卿的情仇、粉孩儿和香柳娘的故事；在现代，有出生于1924年的白蛇附体的秋白的故事。在白蛇的前世今生里，“人间”的生存逻辑悖谬而残酷地一再重复。

李锐设置了两组迥然有别的关系：人类和异类。前者以碧桃村人、北方城郭的人们和法海、范巨卿等为主，后者以白娘子、小青、粉孩儿、秋白为主。异类总因诸多异于人类之处而遭到诟病、驱逐甚至屠杀，人类也总以成功清理自身发展途程中的异质而得以骄傲宣称历史的进步。这一历史进化论早已受到质疑，这种质疑也是《人间》的写作原初驱动力，通过人类/异类的对立关系，呈现出恶/善、仇恨/原宥、暴力/正义等二元结构。白娘子滴尽鲜血救活了蛇毒的碧桃村人，却被重重围剿惨烈无情；小青千里迢迢救回情人范巨卿，却被情人无情手刃；为了逃避世人对粉孩儿的鄙弃，许宣不得不带着他四处漂泊；秋白与许仙再续前世未了情，却在1957年的“反右”批判会上，遭到许仙无情的“揭发”和“控诉”，被驱逐出人群……千百年来，人类行正义之名，上演了一幕幕屠杀和驱逐的人间悲剧。

李锐是一个具有深重历史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他的《厚土》《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等淡淡数笔记录下知青与吕梁山农民不可弥合的龃龉与裂隙，弥漫着最高领袖意志的残余影响和历史的巨大伤痛。在《人间》中，李锐介入历史的宏大意愿依然如故，这本无可厚非，一个具有完整历史观的作家的价值判断应当一以贯之的。问题是，当这种介入意愿过于强烈时，作者就无法再隐身于文本之后，他越过叙述者和人物，以上帝般全知全能的视角将人性的每一个道德角落都翻了个遍，以强劲的说教意识和急迫呈露自我立场的焦虑撕开了神话混沌天真的面目，于是，带着强烈道德指责和理性教化的语言多处呈现：作者在情节描写中忍不住大发关于“正义之名”“大悲悯”等议论；在人物的对话中，作者的身影如此巨大，以致强行夺去了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和话语逻辑，单纯成为作者的“传声筒”；就连那本应具有无上神秘性的《法海手札》，也以法海对除妖人命运的“将信将疑”表达了作者解构“人性进步”的价值取向；作者还特意加上秋白这一故事线索，以期连接起古老传说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但由于故事的道德指向依然是蒙昧的大众和狂热的人群，鲜明的善/恶、人类/异类的对立使古今“白蛇”谱系呈现出单薄的意蕴，20世纪的人文悲剧被流放为叙述的外壳。李锐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该书是他和妻子蒋韵合作的结果，虽然文字的阴柔和结构的疏松有女性的痕迹，但那些带有强烈教谕色彩和精英启蒙姿态的段落无疑是刚性的。

小说不是历史说明书，也不是道德训诫手册，小说所要做的是，以虚构和想象重现对世界的重新认识，这种重现不是作者强加给读者的，而应该通过具有艺术才能的搭建，引导读者进入脱离现实的另一个空间，使心有灵犀的读者自觉与作者“合谋”，共同完成对历史的填补和世界的建构。按照李锐的说法，《人间》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反思和隐喻”，联系着“世界大战”、“文革”等借“进步、文明”名义制造的悲剧。但是，小说未能如愿，那些直白的观念、浓厚的道德训诫和概念化阴影掏空了神话所指，阻止了读者对“反思和隐喻”的想象性连接。

■曹霞